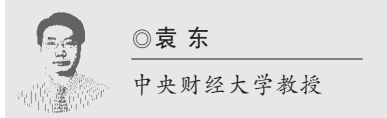


# Column

■知无不言

## 环境成本：无法承受的代价

——兼议好坏产出的替代性



◎袁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生平第一次去山城重庆。那天，天气格外得好，能见度异常清晰。从飞机窗口向下看，在山峰林立中，印象最深的是，只要有人居住的地方，山头便是刺眼的斑驳而苍凉，这些高高的山头，几乎被平整地削去了尖，四周纵横的深壑峭壁间拥挤着一块块平台，那上面或者是耕地，或者是聚集着的民居，或者是冒着烟的工厂。与那些浓荫覆盖的墨绿山峦相比，这些山头就像人的遮羞布被揭去那般难堪与尴尬。

当飞机飞入那些没有人类居住的山上空时，则是另一番景象。中国最湿润的地区，孕育着那一条条苍翠葱郁的山脊。一眼望去，缥缈如纱的薄云缭绕着千层叠嶂的山峦，任何一幅西洋油画都没法描绘那种美，或许只有有高度写意的中国画才能体现那种神韵。此刻，真让人领略了千江之美。以曲折绵延的长江为主干，大大小小的河流，蛇行龙跃，在太阳的照射下，像一条条绚丽而欢快的飘带缠绕山间。

山城重庆，如今满眼皆是拔地而起的楼群，宛若一片钢筋混凝土的森林”。也难怪，整个重庆市3500万人，有近1000万人居住在狭小的市区内。令我印象更深的还有穿城而过的长江，水流倒是不慢，但浑黄泛红，没有任何上游长江的那种清澈之感。真不知，重庆之上的水土流失有何严重，更不知每年由此带给三峡水库多少泥沙！

对这种反差，人口压力与技术落后是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原因。在自两千多年里，中国几乎都在一个粗放外延经济扩张路径上发展并维持。1952年的工业产值仅仅占到GDP的83%，因而长期是一个农业社会。加之技术落后，农业时代的粗放外延经济扩张只能靠开垦新的土地。所以，当南中国湿热地区未被开垦时，四分之三的人口集中在北方，特别是以小麦和谷子为主要作物的西北黄土干旱农业区。受可耕地与产量有限，在新纪元的第一个千年里，中国的总人口一直徘徊在5500万至6000万人之间，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

当南方湿地被开垦，尤其是发现并引进了多季水稻种植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被大量开垦。这引起了中国人口总量及其分布结构的巨大

无论是当前，还是可预期的今后，在总能源消耗、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上，中国都占有很大比例，加强环境管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空间，因之也相当可观。这就是中国积极参加各种全球范围内多边或双边环境控制规则制定与合作的意义所在。

变化。人口到1280年突破1亿，其中四分之三聚居在南方。尽管此后，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口总数有所波动，但趋势是增长越来越迅速。1560年突破1.5亿，1730年超过2亿，1780年超过3亿，1830年为4亿，1933年突破5亿，1955年超过6亿人，1965年过7亿人，1970年过8亿人，1974年过9亿人，1982年突破10亿人，2005年超过13亿。在缺乏工业及其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到1978年时的工业产值也才占GDP三分之一），技术停滞及其带来的非常有限的土地生产率，只能逼人们不断扩大可耕地面积。

然而，地形、地貌和气候决定了中国是世界上可耕地比例最少的国家之一。到上个世纪末，这一比例仅为10%，而欧洲是25%，印度是50%；美国可耕地面积是中国的2倍。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大问题：耕地扩张速度永远大大落后于人口增速，迫使中国人想尽了所有可能的办法垦荒，围湖、填海、毁林造田的本事用到极致，造成了大规模的环境破坏。

可见，世上任何好东西，都是有代价的。所谓好东西，当然是以满足人的需求或效用最大化为标准的，以人为判定主体，只不过有少数人还是多数人，一代人还是几代人的区别罢了。所以，经济学一个核心原则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中国用太有限的耕地，孕育了增长最快人口群体，这不能不说是好事。但代价是，陆地面积占全球22%的中国，森林只占不到7%，以及种种难以后继的环境成本。

如果说农业时代中国经济产出的环境代价已令人不安，则今天处于工业化快速进阶阶段的环境成本就更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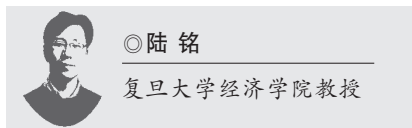
人担忧，这是今后中国面临的巨大难题之一。尽管过去30年间无论是GDP总量还是相对增长都为可观，但人们习以为常的官方统计意义上的GDP，并非都是“好产出”。如果将那些给当代人或下代人带来负效用的“副产品”——比如环境污染与破坏等——归为“坏产出”，则真正给人们提供正效用满足的GDP只能是两者之差。因而，诸如温室气体排放量、山林江河湖海的破坏度，如果不甚至变小，即使GDP增速不变，“好产出”的增长也能提速，公众福利水平也能提高。这是为什么中国应当积极参加各种全球范围内多边或双边环境控制规则制定与合作的意义所在。

即使从纯经济角度看，以减少污染与破坏为内容的环境管制或保护，往往伴随着更大的技术进步率和效率改善，从而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实际上，如果考虑了对环境成本的控制，亦即对“坏产出”增长的抑制，过往的真实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都会高于官方公布的水准。以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温室气体排放量提出限制为起始，到2004年，有关对占全球排放量60%的APEC地区的计量分析表明，在没有任何环境管制情况下，该地区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0.44%，而在要求排放量不变和减少的两种情况下，生产率年均增长水平分别为0.55%和0.56%，不仅都比第一种情况高，而且生产率改善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技术进步。该计量分析还表明，在工业产值占到25%之前，随着工业份额的上升，生产率指数是下降的；一旦超过25%的份额，生产率指数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上升。这意味着，在一定工业水平之上，工业化的推进，随着环境管制要求的提高，以污染与环境破坏为内容的“坏产出”增长幅度的停滞和下降，“好产出”的生产效率与增长会得到改善。

由此看来，无论是对GDP的认识与划分，还是从真正提高公众生活质量角度讲，中国政府都应当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加强环境管制的政策安排。因为，无论是当前，还是可预期的今后，在总能源消耗、碳排放以及碳排放量与能源消耗量的比例上，中国都是一个“大国”——2003年的上述三项指标已分别占了全球13%、15%和117%，所以，加强环境管制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与效率改善空间，都会相当可观，也将大大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真实增长水平。

■铭心之论

## 从都市生活居住模式看活力之源



◎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去年我在巴黎，算是见识了花都的宝贵。在并非上佳的地段，房价都卖到了每平方米1万欧元（相当于约10万人民币）。即便如此，巴黎的人口最近几年又开始增长——不是巴黎大区（Ile-de-France），而是巴黎市。其实，好几年来的巴黎市的人口就扭转了大半个世纪以来的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法国朋友告诉我，在巴黎还出现了中产阶级大量搬离市中心的趋势，而现在住在市中心地段的，有两类人，一类是高收入者，一类是低收入者。

千万别认为巴黎的故事是个偶然。决定现代城市发展以及城市最优规模的，主要是由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增加，一方面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增加，一方面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地互动，而这对于一个城市（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都市）来说特别重要。因为服务业的产品可运输性非常差，它的生产和需求往往都是本地化的，这就需要服务业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最好能够住得近一些。在服务业中，还有一类是高端的，即知识和创意密集型的，而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往往也需要借助于面对面的互动。从事这类行业的人都知道，并不只有学校才是知识和创意的生产与传播基地，新的思想往往产生于咖啡馆里的一次思维碰撞。事实上，一个城市的活力之源，就在于这个城市的思想、知识和创意，有了这样的思想、知识和创意，才会最终提升了一个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成为支撑城市的消费、房价和地价的根源。

现代大都市的居住模式就这样在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过程中形成了，中产阶级搬离市中心，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相伴住在市中心并非偶然。一个都市的繁华意味着消费品和服务的多样性，高收入者能够支付这样的消费，同时，他们也在消费和交往中交换着信息，创造着思想和机会。而所有这些，也必然需要另一群人提供服务，这部分人不需要创造，但需要熟练，不需要聪明，但需要敬业。当现代的高科技（特别是电脑）将大量的制造业岗位占领以后，人类社会出现了职业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从传统的制造业中被排挤出来，他们如果不能成为电脑替代不了的大学教授、医生和金融家，就只能进入酒店、餐馆和家庭，提供熟练的服务。由于他们的收入不高，所以，他们也不能住得离市中心太远。在巴黎，低收入者甚至能够从政府那里得到一些居住的补贴，以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里居住并且工作。相比之下，中产阶级在工作之余的消费中获得的知识、创意和机会不如高收入者那么多，而他们的收入又使得他们宁愿住得远点，舒适点。

于是，能够让生活更美好的城市便成了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相伴而居的地方。高收入者离不开低收入者，如果没有一群人熟练地提供着包括照料家庭和办公室秘书这样的工作，那些高收入者哪有时间去提供创意？事实上，正是在享受服务的过程中，高收入者完成了自己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再生产”。低收入者也离不开高收入者，如果不是高收入者用思想、知识和创意去产生价值，那么，就很少有人能够

支付得起消费服务的价格。

中国正在努力建立创新型的社会，城市正在迅速地长大，我常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当中国还有大量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劳动力时，怎样建立起创新型社会？其实，即使在最先进的国家，真正在从事创新活动的人也永远只是一小部分，但恰恰是这一小部分人的创新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发达的服务业则成了创新型人才不断被“再生产”的保证。

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不应该惧怕收入和工作的分化。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大都市）不应该拒绝走出传统农业的人们。城市居民应该成为创造者，并且用自己的收入支撑起一个服务部门，为那些走出农村的人们提供工作岗位。不仅如此，城市居民还应该有能力为农民兄弟提供培训，让他们能够在城市里熟练工作的技能。如果做不到这些，却一味地怕外来的劳动力挤占了自己的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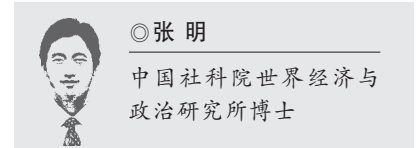
作和福利，那只能说是城市居民自己的不自信。

同时，我也反对一种流行的观点，简单地认为在发展中国存在城市贫民窟是合理的。城市贫民窟在一些国家大量存在，恰恰是因为农村和城市居民没有平等的就业权和发展权，从农村迁入城市的人们也得不到平等的对待。也正因此如此，进城的人们哪怕是居住在贫民窟里，哪怕在城里受到不平等对待，也好歹能够享受一点点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比生活在农村还是好一些。我们不能把一些国家的贫民窟作为发展的必然，而更设法找寻在发展中不出现大面积城市贫民窟的途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然是建立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规模经济的基础之上，和谐的城市理所当然是不同收入的人群相互需要的城市。如果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只是因为农村的生活和公共服务太差了，而城市又充满着歧视和排斥，那样的发展即使不说是失败的，也肯定是不可持续的。

■内外

## “小而灵活”VS“大而重要”

——“我看国际金融中心”之三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圳与香港接触（例如计划中的“港股直通车”的出发地就选择在天津）。深圳作为对外开放窗口和定位已式微，在中国金融市场中地位的相对衰落。

深圳深知，单靠自身的整体实力与资源禀赋，绝难与北京、上海竞争。唯有与香港捆绑在一起，才有望在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中取得一席之地。而香港在面临来自上海的强力挑战的背景下，也期望通过深圳与内地建立更紧密的金融联系。2008年6月，《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发展促进条例》开始实施。该条例将深港合作纳入深圳金融发展战略，提出以深港金融合作为纽带，巩固/提升深圳金融中心城市地位，为两地构建联通境内外的一体化资本市场创造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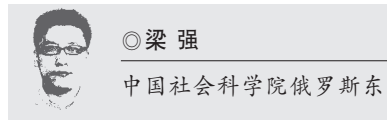
与深圳不同，天津曾经有过显赫得多的金融历史。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曾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北方金融中心。抗战爆发之前，天津拥有本国银行、钱庄103家（其中10家的总行设在天津），占全国银行总资本的13%，占全国银行存款总额的18%；拥有外国银行17家，占外国在华银行资本总额的16%。天津的解放北路一度与上海的外滩同享盛名。然而1949年之后，天津金融市场风光不再。天津的幸运与不幸，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相距200公里左右的北京息息相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北京巨大的虹吸效应”下，天津的人、财、物资源都纷纷从本地流向北京。天津基本上沦为北京的制造业基地和出海港，其地位也是几大直辖市中最尴尬的。作为直辖市，天津和重庆在中国宏观经済中的地位要低于深圳和广州，成为典型的二线城市。

自2003年，前央行行长戴相龙出任天津市长之后，天津重燃金融中心之梦想。2004年2月，北方产权交易中心落户天津，首家中外合资的住房储蓄银行——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开始在天津营业；2005年，中国风险投资（Venture Capital, VC）历史上第一家合伙制外商投资VC基金——赛富成长创业基金在天津开发区注册成立，全国第一家省级农村合作银行——天津农村合作银行正式成立，首家总部设在天津的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正式营业。2006年3月，全国首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国内称为产业投资基金）——渤海基金在天津成立。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创新，都建立在中央政府的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基础上。在2006年5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中，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把金融改革创新作为重点。2006年8月，国务院批复《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年）》，未来15年时间里，作为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的天津市，要以滨海新区的发展为重点，逐步建设成为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现在，天津正在充分利用中央政府赋予的一系列推动金融创新和改革试验的机会，在风险可控原则下，先行先试，谋求在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多种所有制金融企业、离岸金融业务等方面取得重点突破。

深圳与天津都背靠着一个大都市，但两城最大不同在于，深圳与香港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而天津与北京之间却存在着一定竞争关系。看来，如何处理好与邻近大都市之间的竞争关系，充分发挥各自的金融创新优势，找准各自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独特定位，是深圳和天津未来发展关键。更现实，相对于深圳与天津而言，更明智、更现实的选择是，夯实自己在区域金融市场上的中心地位，在国内金融城市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成为区域金融中心。

■新垦地

## 维也纳足球盛宴掀开欧洲政治新版图



◎梁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所博士俄罗斯问题独立评论人

希丁克毫无疑问是俄罗斯足球队在本届欧洲杯上的最大功臣，但俄罗斯球迷们也在球场上打出的巨幅画像却并非这个荷兰人，也不是球队中的某位明星，而是彼得大帝——俄罗斯民族国家奠基者和强国地位的象征。与法国球迷抱着高卢公鸡，西班牙球迷们打着斗牛士旗帜为本国球队加油相比，俄罗斯球迷们的助威方式不仅别开生面，也更具有俄国特色——从一个籍籍无名的二流球队跃升为新的欧洲足球强国，俄罗斯在让世人见证了一个新足球大国崛起的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彼得大帝当年领导莫斯科从一个偏居公国一跃而成欧洲五强之一的历史轨迹在惊人重演。

自1988年苏联打入欧洲杯决赛后，俄罗斯足球再也没有为这个国家带来任何值得一提的胜利，2004年俄罗斯队以2:8的大比分输给葡萄牙，更成为俄国足球史上的国耻日。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足球的奠基者荷兰在2006年全面入主俄罗斯，在两位前荷兰国家队主教练埃德沃卡特和希丁克的率领

下，俄国足球面貌焕然一新，并且终于在当年取得巨大成功——圣彼得堡泽尼特俱乐部夺得联盟杯冠军，国家队则历史性打入欧洲杯四强。而彼得大帝励精图治，也正是始于向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商业国家荷兰的学习。当年他以学徒身份遍游欧洲诸国，最终选择了荷兰作为全面效仿的对象。原因很简单，比起法国的礼节，奥地利的组织，英国的服装，德意志的管理，荷兰人的重商主义和实用主义对快速提高落后的农奴俄国的国力最有帮助。

但这次向西方全面学习，因更关心实际可用的知识而不是内在思想的提高，却成为制约之后俄国发展的桎梏。用历史学大家阿克顿勋爵的话说，彼得大帝所理解的文明是物质性的，而非思想性的。因此，俄罗斯虽然成了欧洲五强国之一，但却依然多次遭受濒临灭国的危险，并且在世界文明舞台上始终难以位居前列。在这次欧洲杯上，俄罗斯队的战绩也暗合了该国在国际舞台上大起大落的命运，虽然非常漂亮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荷兰，但却两次以大比分

完败给西班牙，这不但再次印证了俄罗斯民族爱走极端的性格，也充分证明，俄罗斯足球要成为真正的世界豪门，底蕴显然还远远不够。

本次欧洲杯上，四强座次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全欧组合——西欧西班牙、中欧德国、东欧俄罗斯、南欧土耳其。欧盟之父？莫内50年前的梦想——欧洲不再只是作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发源地的拉丁和条顿这样的西欧民族的专属舞台，而是这一文明几百年以来不断化和浸淫下的包括了东欧斯拉夫民族和南欧伊斯兰民族在内的共同大厦——终于通过一场全欧足球盛宴得以部分实现。而新的全欧图景的欧洲足球格局，尤其是俄罗斯和土耳其在赛场上掀起的风暴，也正体现了欧盟东扩后新欧洲的政治版图。

俄、土两国的前身沙俄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历史上一直是欧洲文明向东方扩张的两大堡垒，欧洲各民族与伊斯坦布尔和莫斯科的斗争也成为欧洲文明演进的一条副线。在关键时刻两国都曾介入到欧洲国际政治中去，极大影响了欧洲文明。一战后，两大帝国分崩离析，但接踵而来的二战和冷战却让欧洲文明向这两大方向的扩张再次受阻。尤其是冷战开始后在东欧废墟上新组建的苏东联盟，硬生生将欧洲划出了一道

铁幕，不但阻碍了欧洲内部传统的政经交流，而且由于其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使欧洲文明的扩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土耳其虽然在其开国之父凯末尔的领导下，一开始就确定了两个基本的国家大战略方针：走世俗的民族国家道路和努力向欧洲靠拢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员，但其回归欧洲的努力也受到了冷战的影响。1952年土耳其就加入了北约，但直到冷战结束后，在1987年才正式递交加入欧盟的申请。

冷战结束后，两国重新开始了回归欧洲的历史进程。但受新的地缘政治和“文明冲突”因素的影响，两国的回归之路仍然坎坷。欧盟虽然接受了土耳其的入盟申请，但却迟迟以经济借口不开入盟谈判。9.11”后，以伊斯兰原教旨为背景的恐怖主义大行其道，更是让保守主义主导的老欧洲担心土耳其高达7000万的穆斯林人口加入，将对欧洲文明与价值构成极大威胁。梵蒂冈新任教宗拉青格在2006年土耳其和欧盟再次举行入盟谈判前夕曾经公开表示，欧洲是一个文化的大陆，而不是地理上的概念。它的文化决定了它共同的特点。因此，土耳其在历史上始终意味着另一个大陆，永远与欧洲不同。”他还警告说，随着欧盟不断对不同文化历史和文明国家的吸纳，尤其是随着土耳其

的加入，再过十几年，欧洲就会成为“北非和中东的延伸”，最终将因为“境内民族众多，相互敌视，而导致分崩离析。”同样，北约东扩和美俄在独联体地域内的政治争夺，让俄国的欧化之路崎岖难行，以至于俄欧之间出现了新冷战的迹象。欧盟现在已吸纳了东南欧的所有国家，但土耳其和俄罗斯却一直都被排斥在外。土耳其在2006年通过谈判成为欧盟的准成员国，但却被看成是与欧洲的一次“试婚”，能否与欧盟最终缔结良缘还很难说；俄罗斯则至今仍所谓的“欧盟——俄罗斯委员会”中苦等佳音。

因此，在本届欧洲杯上，当俄、土分别击败荷兰和葡萄牙进入四强后，两国都处于全国性的狂热之中，甚至一度引起骚乱。《共青团青年报》声称，俄罗斯足球的成功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政治上成功的理所当然的延续。”体育和政治在这次欧洲杯上以最直接、最坦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了，以至于国际足联技术部主任奥西埃克也语带玄机地称，以俄、土为新代表的东南欧足球在本届欧洲杯上之所以表现出了比传统的西欧足球强国更多的激情和活力，更先进的技战术水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更加渴望以胜利来为本国赢得在欧洲舞台上的尊重。